

阿陀斯山正教修會歷史素描

盧 德¹

本文作者繼編譯《聖山沙漠之夜—隱修導師談〈耶穌禱文〉》²一書之後，續以阿陀斯聖山中隱修生活與制度的發展，向我們描繪出正教修會歷史發展的梗概。透過對聖山修院制度建立的認識，我們一方面由教史角度來認識正教會，與之交談；另一方面也祈望教父生活傳統的傳承，開啓我們靈修生活的復興之路，亦即以〈耶穌禱文〉走我們的「天主化」之路。

前 言

隱修制度早在基督教會有組織的成形之初，便已出現在歷史上了。由於後來羅馬教會及早期拜占庭的倫理生活散亂，城市中的基督徒團體融合了兩組靈修生活：其一，教會生活的混亂帶動了異端邪說及教會的分裂；其二，甚至出現了結合其他

¹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為：Kriton Chrysochoidis 著，“A Historical Outline of Athonite Monasticism”，*Images of Athos, Mt. Athos*, 1997。盧德，本名楊素娥，輔仁大學宗教學碩士、輔大神學院教義系博士，兼任輔大神學院編輯，並任靈修心理學教師，現正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宗教與神學相關作品散見於教會內外出版機構。

² 原名 *A Night in the Desert of the Holy Mountain—Discussion with a Hermit on the Jesus Prayer*，盧德編譯，收錄於上智新泉 6，台北市：上智出版社，2003 年。

宗教的多種隱修生活形式；而這種種的形式發展，皆有助於苦修的理想，在基督徒中間形成達至靈修成全的一種方法。這個理想，在團體性與個別性的靈修生活中，實際地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形式。

一、隱修制度的最初形式—退隱於荒漠中的默觀靜思

雖然隱修制度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發展，但其靈修的發源地乃是在埃及³。由於埃及出現過極具盛名的苦修者⁴，加上它「大沙漠／大荒野」的傳奇性形象，其地理環境非常適合絕對的獨修及嚴苛的苦行生活。

隱修制度的最早期形式，是退隱於荒漠之中，由大聖安當（Saint Antony the Great）為其先鋒；約莫同一時期的聖帕哥默（Saint Pachomios，歿於 346 年）建立了團體共修的修會生活形式⁵。這兩

³ 參：甘蘭著，吳應楓譯，〈東方的隱修主義〉《教父學大綱》卷二（台北：光啓，1990 年再版），471~481 頁。

⁴ 埃及的隱修制度以聖安當（約 250 年左右出生於埃及中部的赫拉克來奧堡，20 歲起即已在其村莊附近開始他的獨修生活，15 年後他遷往東方紅海邊的叢山之中，一群獨修者接踵而至地來請求他的指導，《聖安當傳》即是由聖亞大納削寫成，聖安當歿於 356 年）為首，他的傳記和隱修生活的典範，吸引了不少人的效法與跟隨，也因而產生了不少著作的流傳，甚至逐漸形成複雜的組織和制度（包括獨修與共修的不同生活方式）。這些「曠野隱修士」的相關文獻，包括歷史性的、傳記性的、格言錄（Apophtegmes）等，透過希臘語本的翻譯，逐漸流傳於西方。

⁵ 該隱修生活地點初步設在埃及上部的提易德荒野，320 年聖帕哥默遷隱至底伯斯（Thebes，尼羅河的一個小島上）附近。他開始組織一些規例、制度，如服從長上、嚴格的紀律，初期即有數百名隱士共修於一個修院中，但修院的數字不斷增加，到了 400 年時，

種生活方式（即聖安當的獨修生活、聖帕哥默的共修制度），皆迫使個人靈修採取積極的苦行與自主自治。不過，隱修制度的繁盛時期，卻是在小亞細亞的卡帕多細亞隱院（Cappadocia），由聖巴西略（St. Basil）所制定的規範所領導。由此一連串廣泛的善工中，對於默觀靜思的生活似乎獲得了相當大的回響與鼓舞。

除了埃及和卡帕多細亞之外，隱修制度也在古敘利亞首都安提阿（Antioch）⁶、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巴勒斯坦（Palestine）等地都有蓬勃的發展。

東方的隱修動向，很快地就在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展開來。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第一個有文獻記載的隱修院，乃是 382 年即被提及的達爾馬西亞隱修院（Monastery of Dalmatos），且在第六世紀末已有 92 處分院。

接下來的數個世紀，隱修制度在小亞細亞富裕而有權勢的城市中繁盛起來，幾個重要的團體包括 Olymbos in Bithynia 以及 Lators in Miletus 等的發跡，而且在這些地方也發生了歷史上對抗

已有 5000 多名隱士。在聖熱羅尼莫的譯文與著作中，可看出當時的隱修規範中，已包含固定的祈禱齋戒、勞動和研讀聖書等。聖帕哥默死後，赫爾西愛（Horsiési）繼任總長地位，他在其著《隱修論》共計 56 章中，指出帕哥默院士應守的規則，尤其強調神貧、輕視財產的重要性。這一制度後來在埃及各地設了分院，包括帕哥默隱院附近的 Atrépé，斯努第在此建立了著名的 Couvent Blanc（白修院），部分修改了原來的隱修規範，但其祈禱更長、飲食更淡泊、紀律更嚴苛、且犯錯者應受體罰。不過，共修生活傳到別處，其規範制度也隨之而變。聖巴西略（St. Basil）所領導位於小亞細亞的卡帕多細亞隱院、聖奧斯定（St. Augustine）所領導的拉丁非洲隱院、以及陸續也創立了的女隱修院等，或採獨修生活、或採共修生活，但都多少受了最初這些隱修祖師的影響。

⁶ Antioch 或譯安提約基亞，現今地理位置在土耳其南部的一城市。

聖像敬禮的激烈衝突⁷。

二、隱修制度（修會憲章）的建立與傳教使命相連

Bithynia 的靈修氛圍，尤其滋養了八到九世紀時拜占庭隱修院的偉大改革者—德道⁸。隱修生活的會規，置於德道有關《教理書》（*Catechism*）⁹及《禮儀日曆》（*Typikon*）或其修會憲章中，旨在致力於絕對的規律生活，包括修道者的敬拜與每日生活。他的會規隨後迅速地對阿陀斯山上有組織的團體會院，有一極深的影響。

第九世紀，東方教會在宗主教佛西要¹⁰接下新領導角色之後，重新復甦了起來，修道者被視為是從事更加廣泛的工作。

有兩位修士，Thessalonikians Constantine-Cyril 和 Methodius 都是修道人，他們被派遣到拜占庭北方的鄰國去傳教。此由修道人所作系統化的福傳工作，促使巴爾幹半島上的斯拉夫民族

⁷ 敬禮聖像之爭，乃第七世紀起，東西方教會在許多教義詮釋之不同的分歧點之一。主曆 717 年，良三世繼位君士坦丁堡皇帝時，在政教強權下，認為敬禮聖人聖像乃是偶像崇拜，而下令全面禁止、抵毀所有聖像，引發當時信友的強烈憤慨。甚至在其子君士坦丁五世繼位（741~775 年）後，對維護聖像敬禮者加以拘捕、放逐、殺戮等迫害事件增多。直到 787 年召開尼西亞（Nicaea）第二屆大公會議，釐清聖像敬禮的真實意涵，並對敬禮與崇拜二詞之意加以詮解，才稍得緩解。然而不幸地，聖像敬禮之爭又於第九世紀死灰復燃，終至 1054 年東西方教會正式分裂時，此衝突仍未獲得解決。

⁸ Theodore the Studite, 759~826 年，擁護聖像敬禮者。

⁹ 即「要理講授」。

¹⁰ Patriarch Photius, 858 年繼任宗主教之位時，引發了正教與羅馬教廷極大的爭議和緊張關係。

(Balkan Slavs) 得以皈依基督宗教。

至於希臘本身，直到第九世紀有其組織化的修道生活仍舊極少（雖然考古學顯示了些許初期基督徒在 Thasos、Delos、克里特島等島上的修道團體）。在希臘，修道制度的建立並未與傳教工作分離，修道士仍負擔著相當的傳教使命¹¹，特別是在 Thessaloniki、Larisa、Patras 等地。在 Peloponnesus，西面修士 (Br. Symon) 和德道修士 (Br. Theodore) 建立了大洞窟修院 (Monastery of the Great Cave)；而第九世紀在 Macedonia，拜占庭教會在 Halkidiki 建立了大規模的修道中心(包括 St. Euthymius 和 John Kolovos 的修院)。

傳教士和隱修士的各種活動，在第十世紀的希臘達到頂峰，其中又以 St. Nikon the Repenter、St. Lukas Steiriotes 和 St. Athanasius the Athonite 最為首要。

修道人此時所有計畫性的成果，乃直接結合了帝國運動，以便重新整合巴爾幹半島上各民族在修院內外的制度，以便擴張帝國的防禦、延伸拜占庭在鄰近基督宗教各民族的影響力，並抵銷羅馬對鄰近地區所滲透的成果，因為這些鄰近地區對拜占庭而言是極為重要的。

三、阿陀斯聖山隱修院的建立

此時的靈修努力，還包括了阿陀斯山上建立的第一座隱修院—即 963 年建立的大拉夫拉修道院 (Monastery of the Great Lavra)，創立者阿陀斯山的聖亞大那削 (St. Athanasius the Athonite) 乃一活躍而極具天賦的修道人，同時也是一名上流階層的朝

¹¹ 相較於西方教會，在方濟會與道明會之前的早期隱修制度中的隱修士們不擔負傳教使命。

臣，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官員，並是與拜占庭皇帝 Nicephoros Phocas 有私交的一名友人。隱修院的大量出現，不僅為阿陀斯山的苦修生活顯著地開啓了一新的階段，同時也為希臘建立起幅員廣闊的靈修中心，甚至延伸到巴爾幹半島上的居民及基督信仰的東方世界（Christian East）。

此時，拜占庭帝國的意識型態與政治動向，正處巔峰時期，自第十世紀的後半葉起，為阿陀斯山隱修院的成長創造了一個極有力的環境。此修道環境後來隨著阿拉伯人的入侵，於 961 年驅逐克里特島人（希臘領土）而更進一步地增強，並於愛琴海（Aegean）的海盜入侵而告終。與此相反的是，小亞細亞上一度極具盛名的修道團體，卻因 Seljuk Turks 土耳其人的入侵與殖民深感痛苦，而於 1071 年 Manzikert 戰敗後衰退下來。

St. Athanasius 並非將其修道院建立在一處全然荒涼的不毛之地，而是選擇了一處已有隱修院傳統的地方，此處不僅為拜占庭歷任皇帝所接受，而且某種程度地鬆懈了中央的管轄。

此處在第九世紀初所引發的第二階段敬禮聖像之爭期間，似乎也已成了 Macedonia 鄰近地區維護聖像敬禮的修道人、在阿陀斯躲避毀滅聖像者迫害的臨時避難所，似乎在這一省分中的迫害是特別溫和的。

阿陀斯山上第一次有關於隱士的文獻記載，約於第八世紀末、第九世紀初時出現。這些文獻相當模糊不清，只提到幾個特殊隱修士的名字。在這群人中，最為人熟知的，應屬住在當今 Kafsokalyvia 這地方的 Peter the Athonite 了。簡要地說，第九世紀中葉之後，St. Euthymius 在 Halkidiki 之 Vrastamou（即當今的 Vrasta）建立了大修道院，在他創立大修道院以前曾是阿陀斯山上的一名隱士。

第九世紀中葉之前，阿陀斯山上的修道人已塑造了一個極有分量、衆所周知的隱修團體，並得到君士坦丁堡的 Theodora 皇后的款待。根據歷史學家 Genesisios 指出，阿陀斯山上的修道人在 843 年時，被視爲是崇尚恢復聖像敬禮者。

833 年，阿陀斯山隱修院第一次獲得皇室特權。皇帝巴西略一世 (Emperor Basil I) 頒布一道勒令，豁免在此修道者的課稅，並且禁止附近居民 Erissos 及其畜牧等的進入。908 年，嗣子皇帝智者里歐四世 (Emperor Leo IV the Wise) 正式認可阿陀斯從 Erissos 附近的 John Kolovos 大修院中獨立出來，並確認了禁止侵占此山的禁令。941~942 年，皇帝 Romanos Lacapenos 在阿陀斯山設置了皇室授權，即大家所熟知每年一度所予的一枚 roga 金幣。一年後，即 943 年，皇帝 Thessaloniki 指派其將軍 Katakalon 在阿陀斯山劃設邊界。此邊界一直保留至今仍未改變。

第十世紀初，雖然修道人散布在整座山之中，但仍接受一些中央行政管理的規範。908 年，第一次出現最高行政「首長」於卡耶斯¹² 相當於最高階主教的一領導人，成爲團體對內的仲裁與對外的代表人，並三次召開年度大會，召聚所有修道人建立處事的共識，分別於聖誕節、復活節、8 月 15 日的聖母升天節 (Dormition of the Virgin)。同一時期，也建立了更大的修道院，如 St. Paul of Xeropotamou 修道院、Clement 修道院 (後來併入 Iviron 修道院中)，以及靠近當今 St. Anne 隱修團體的 Vouleftiria 修道院。

即便如此，隱士生活中的神貧與靜默，仍持續地主導著他們的生活，並成爲他們極度嚴苛之生活的泉源。隱士們居住在臨時搭建的簡陋小屋中，只靠著尋找森林中的果實維生。這樣

¹² Karyes, 阿陀斯山的首府、特區。

的生活型態，仍然持續到下一個世紀，直到聖亞大那削（St. Athanasius）抵達、遊歷此山時。在《聖人生平》中，可見他們生活方式的典型描繪：

「隱士們從不耕種土地；他們既不犁田，也不挖渠，亦不占有牛隻、驢子，或其他可負重的牲畜或狗等等，卻只生活在由樹枝搭建於地、覆蓋茅草於頂的簡陋小屋中。因而他們忍受酷暑、嚴冬，以及咆哮的風寒。……除了精神食糧以外，他們的身體食糧只靠山上簡樸、未經烹煮的食物維生。……他們收集野果，然後靠這些食物度日。」

聖亞大那削抵達此山，並在此建立了大拉夫拉修道院之後，擾亂了謙卑隱士們的寧靜。這個新修道院的內部組織，及其多重的建築和經濟行爲，對此山完全是一新的型態。這是阿陀斯山首度建立起中央行政管理的大型修道生活型態。

大拉夫拉修道院由皇帝親自奠基，並在他死後仍持續保有獨立自主權，在皇室的保護下，在民法上它具有獨立合法的主體。此修院由一名院長主理，並在他死前指派一位具長老會議助理資格的人，擔任繼承者。

從大拉夫拉修道院創立之初起，金錢開銷的數字相當龐大。單單初期工作 Nicephoros Phocas 就贈予了六磅黃金，而聖亞大那削自己也提供了一大筆私人財產。

四、修會生活的新典範——有組織中心的團體修道制度

聖亞大那削對發展修院事工等各項活動，以及土地耕種的政策，是界定新型態修院基礎的最重要特質。此模式在阿陀斯隨後建立的許多修院中，很快地成爲一個新典範。除了建造大型複雜的修道院之外，這位創新的修道人還引進了犁田耕種的

粗活，並善用過去已遭廢棄之修道單人小室等財產；他發展新的農業技術、引導成雙成對的牛隻一起耕田，並興建灌溉系統；他利用最新科技，在修道院設置由水車發動的碾粉工廠，以烘焙麵包；他造船、買船，還為水手們興建倉庫和營地。

雖然此種新型態的修道院，很快地成為重要的農業發展中心，以及手工藝品製造中心，但是修道生活的種種規範卻絕對不容妥協。聖亞大那削對越軌或偏差行為完全不留任何餘地；他保留了可以度嚴苛生活規範的苦修士，同時也要求在此的修道人規律的工作。

然而，阿陀斯山修院型態的逐漸改變，由原來完全退隱的獨修生活，轉而進入一個有組織中心的修道制度生活，引發了不少衝突與爭執。為獨修者而言，他們似乎不受此新型態的苦修生活模式太多的干擾。事實上，大型而有組織的團體修道生活，早已存在於君士坦丁堡並歷經好幾任皇帝，已有數世紀之久，這段期間，團體共修才是主要的修會生活模式。然而這些持有異議者，他們反對的理由乃因害怕這些有活力的新制度，將會併吞並打壓他們的獨修小屋（cells）。

Nicephoros Phocas 的繼位者 John Tsimiskis，覺得有必要解決這些問題，於是他請 Euthymios the Studite 帶著他的指示，至阿陀斯深入調查當時的處境，並協調修院共修者和獨修者雙方，共同制定規章以管理修院團體生活。

這份共同研擬出來的成果，簽署於阿陀斯山上的第一個《禮儀日曆》中，簽署者包括後來以聖亞大那削為名的 St. Athanasius of Lavra 修院，以及 46 位阿陀斯山獨修小屋的領導人和其他修院團體。這份文件於 972 年由皇帝正式認可。原始的文件，由 Tragos（即厚的公山羊皮）所寫成，並由皇帝 John Tsimiskis 親自簽

署，這份被視為是阿陀斯山的第一份文件，至今仍保存在聖山團體中，被視為最無價的檔案的珍藏。

972 年的這份《禮儀日曆》，制定了阿陀斯山的中央行政管理的各種權利與義務，即由首席修院 (Protaton officials) 和於卡耶斯 (Karyes) 所召開的議會，共同推舉首席院長 (Protos)，清楚地界定了修道人之間彼此的關係。雖然這份文件保護了古老的隱修生活方式；但它也明確地認同了修會體制的優勢地位，同為阿陀斯山上苦修生活的一種模式。

這份由皇帝 John Tsimiskis 簽署的《禮儀日曆》，在 1045 年 Constatine Monomachos 統治期間，在他所處理的各項新發展中作了補充、修改。後來在拜占庭統治期間，文件有三分之一遭到修改，幾乎是全新的一份文件於 1406 年問世。這份文件由皇帝 Manuel VIII Paleologos 所頒布，已被視為是各個修院固有的行政管理規範，以及修道人與其領導人之間的關係界定。

創辦的 Lavra 和 St. Athanasius，在他們多方面的各項活動中，推動了許多直接或間接與聖人有關係的名人，建立了許多其他的修院團體。979~980 年間，古代伊伯利亞（英國喬治王朝時代）的貴族 John Tornikos 和其子 Euthymios，在有皇室特權和許可下，建立了 Iviron 修院。隨後不久，三位來自 Adrianople 的富有貴族 Athanasius、Nicholas 和 Antony，也建立了 Vatopaedi 修院。

五、修院團體的蓬勃成長與皇室政策的支持

從第十世紀末起，修道院的建立如雨後春筍，明顯快速地成長。約於主曆 1000 年左右，阿陀斯半島的記錄已有 41 個修道會院。其時，聖亞大那削仍是一名有活力的、第一位由 Amalgi 抵達的義大利修道人，並很快地建立了 Amalfines 修院。Sikelou、

Paphlagonos、Chaldou 三修院亦屬同一時期所建，不過 Rossou 修院則於十一世紀初建立。後來併入存留至今的修院團體的獨修小屋，在當時也還是四處林立。Zographou 修院，建立於 980 年之前，由拜占庭畫家兼繪製聖像者 George 所建立。St. Paul of Xeropotamou 於 956 年之前建立了 St. Nicephoros 修院（即今 Xeropotamou 修院），在 980 年之前又建立了 St. Paul 修院。Xenophontos、Esphigmenou 修院，及 Chelandari 的第一修院，都在第十世紀結束以前即已出現。

在第十二世紀結束以前，阿陀斯山修道團體的各種泛正教（pan-Orthodox）和大公會議（ecumenical）特質的修院，已大致抵定。在 1142 年之前，一座為俄國人所建立的修院已然完成；1198 年，塞爾維亞退職的皇帝 Symeon Nemamja 成為修道士（monk-king）；他和其子 St. Sabbas 獲得許可，重建已毀壞的 Chelandari 修院；而後來的 Zographou 修院，則成為阿陀斯山上保加利亞人修道團體的中心。

除了少數的例外之外，皇室政策對於阿陀斯山是極其寵愛的，其善意貫穿整個拜占庭期間。幾乎所有的修院皆以「皇室修道團體」來命名，換言之，是由皇室所保護的機構，以防民間和教會權威的干擾妨害。其他的特權，還有免課各種稅、由皇帝和貴族共同許可他們得擁有財富，且允許他們使用這些財富去實現其靈修工作。

阿陀斯山修院團體的歷史進程，只有在此一重要時期，與拜占庭帝國共享同一命運。當帝國漸入衰微，修院團體仍持續成長。特別是在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在阿陀斯崛起、發

展一種新的靈修活動—稱為寂靜主義¹³，更新了原先的苦修觀念，並使聖山為巴爾幹半島及俄羅斯的斯拉夫民族，開啓了一新的靈修指標。

修院團體持續地在阿陀斯建造或修復，儘管古帝國在政治與經濟上的衰退，以及民間戰爭和巴爾幹半島的分裂所帶來的擾亂不安。在半島的中心，卡耶斯附近，Vlach 負責重建 Koutloumousiou 修院；而在沿海地區，兩位貴族 Alexios the Stratopedarch 和 John Primikerios 建立了 Pantokratoros 修院。在西海岸線，塞爾維亞的專制君王 John Ugljesa 主要負責建立 Simonos Petra 修院；而 St. Dionysios of Trebizond 則在 Trebizond 皇帝 Alexios III Komninos 的慷慨協助下，建立了 Dionysiou 修院。南方的 St. Paul 修院，數世紀之後已成了廢墟，由兩位塞爾維亞的貴族後裔、同時也是修道人的 Gerasimos Radonja 和 Antony Pagasi 來負責重建。最後，Gregoriou 修院可能是在十五世紀初所建。

六、政治的動盪與修院漸行衰退

1423 年，阿陀斯山被併入土耳其的版圖之中。拜占庭的結束，使得基督徒的統治和一切事務的新處境，無可避免地改變了阿陀斯山修院修道人們的政治動向，並引發了痛苦的財務問題，也因而逐漸改變了阿陀斯山的基本組織結構。不過，這些改變的速度相當緩慢，而其適應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情勢，並未影響到修道生活的靈修原則。

與土耳其當權的合作，基本上可以維護阿陀斯山團體的自

¹³ Hesychasm, 此乃獨創於希臘正教阿陀斯山於十四世紀所發展出來的一種神秘主義的靈修活動。

治權，以及各個修院所擁有的土地財產。

與一些戰勝的基督徒民族相比，蘇丹初期對待阿陀斯山的態度相當友善。修院團體的自治權受到尊重，在半島上修院財產的課稅輕微。不過，阿陀斯山的課稅乃是一次付清總額，修院當局還可以爲此決定如何分配這筆負擔。在阿陀斯山以外的修道人，希望並試圖爭取對其財產同等的待遇，卻只有部分的人成功而已。

雖然直接課稅並非特別沈重或麻煩（除了某些時期以外）；然而其他額外的課稅和義務，尤其是稅吏武斷蠻橫的行爲，使得各修院處於一難以忍受的負荷之中。從今日修院的檔案館裏，充滿了各式詔書¹⁴、官方勒令，以及修院命令的頒布等，在在顯示了問題的嚴重性與範圍，以及蘇丹試圖處理的方法。

修院原有的大量而豐富的附屬事業，無法毫無損傷地被保存下來。很多修院漸行衰退；而他們的收入，也如土地一樣，部分甚或完全地被沒收了，給了土耳其的封建地主，或者龐大而肥沃的土地，也被吞併到蘇丹的資產階級者手中。1568~9年，有一場沈重的打擊，時值蘇丹王 Selim 二世發了一道特殊的行政命令，徵收了所有的修院財產之後，又再次強制修道人們將這些財產買回。而此買回的價值，要求陀斯山 14,000 黃金弗洛林幣（gold florins）。

這些土耳其當局習慣性而蠻橫專制的舉動，還引發了其他不少的災難發生。天然災害如火災、地震的變形外，還有海盜、搶劫及軍事作戰等，頻頻抵毀了修院試圖修復的努力，而導致後來的負債更加沈重。

¹⁴ Firman，特指當時土耳其皇帝所予的詔書。

在土耳其人統治的前數百年期間，幾乎所有阿陀斯山的各個修院都面臨財務吃緊的情況，而其維繫與開發的財務，也僅夠他們勉強生活下去而已。阿陀斯半島的生產情況，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維生，因為此處的課稅可以人頭稅來作抵銷。蔬菜園和葡萄園、原木砍伐、橄欖與水果的栽種等，都是半島上的居民主要的生產與活動，使他們的維生情況較好。

然而，這裏的生產畢竟不足以滿足所有修院的需求。這段期間，他們的收入主要來自：（1）有系統地開發和推銷其附屬產品，以逐漸恢復並增加捐贈和購買的收入，因而提供了一個穩定的收入；（2）多瑙河沿岸的一些附屬產品，特別是在十七世紀時已為 Moldavia 和 Wallachia 等正教領導人大量地獻給了阿陀斯山；（3）大筆的財產補助，不僅來自上位的王公貴族們，也來自多位的俄羅斯沙皇，以及慷慨的希臘資深神職人員及仕紳階級等，這些捐贈在修院建築的複雜及裝飾等作品與藝術上，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4）在各地展開金錢募捐，包括希臘東方、偏遠的斯拉夫民族及歐洲等地。

只要土耳其人不干預聖山的內政事務，中央行政管理機制便能如同在拜占庭時期一般地運作，持續大約一個半世紀左右。首席院長（Protos）仍然保留了它原來管理、行政、法律及靈修等的權力，不過組織舊時的聲望已然消聲匿跡了。一年一度的財物授權宣告中止，而首席修院（Protaton）亦發現很難再舉辦具有標的性的聚會。半島上的土地逐漸變成各個修院所擁有，有如獨修小屋在其管轄範圍內一般。法律的功能遭到一些土耳其的下級法官或判官所侵占，致使修院必須在首席修院決定對抗他們時提出上訴的請求。首席院長的制度，在十六世紀末時已漸衰退，最後一位保持此精神的官方記載乃於 1593 年。

具有獨立主權的修道院數量，似乎最終確定是同時有 20 所。其中 19 所乃是拜占庭時期已存在的大修院，只有第 20 所是唯一建立於「後拜占庭」時期的 Stavronikita 修院，於 1541 年由宗主教 Jeremiah I 所建。

七、議會制度的建立，乃至各種修院制度的延展

自十七世紀起，阿陀斯山由一群人所共同管理—即「大議會」（the Great Assembly）。雖然成員包含了所有修院的代表，但本質上還是只由承擔起大筆共同財務負擔的幾個大修院，即 Lavra、Vatopaedi、Ivion 等修院，扮演起領導的角色。此外，一位土耳其的總督亦已設置於阿陀斯中，官方性地保護當地免於海盜、搶劫等，雖然事實上他在聖山的內部事務處理上，占有一相當積極的角色。1661 年，由於首席修院毀滅性的負債，迫使大議會變賣了原來在法律保障下、修院所有的獨修小屋。僅有的財產便留給了阿陀斯山卡耶斯的首席修院。

1744 年，宗主教 Paisios 結合了阿陀斯山修院的修道人，開啓了一個更大的管理議會組織的方法，在其間較小的修院亦可參與其中。大議會從此更名為「神聖的團體」（the Holy Community）。無論如何，這個議會制度於 1783 年，由宗主教 Gabriel IV 在《禮儀日曆》中確定了下來。這份文件放掉了原來由 20 所修院的組成，而分割為每五個修院所組成的四個固定的團體。聖山即由這四個修院的首席代表（epistates）所共同管理，每一個團體推選一位修院代表，其中必須包括來自五大元老級的修院—Lavra、Vatopaedi、Ivion、Chelandariou、Dionysiou。由 20 個修院代表所設的常備委員會，則於 1810 年設立。

修院的內部制度同樣也在進行改革。獨修與共修制度詳細

載明於文件內，一直持續到十四世紀末。不過，逐漸地，尤其在土耳其人征服此地之後，符合個人節奏的制度獲得了受益的基礎；換言之，修道人被允許可以擁有更多個人的生活，以及更多個人回應其召叫的方法。雖然修院院長的職位仍然保留，但缺乏真實的權力，成了只有在禮儀功能上的名譽職位而已。這個職位被賦予卓越之人，曾對修院作有價值的服務和貢獻者，譬如成功地為修院募集大量金額，或善於經營修院的附屬事業。此職位的任期短，而且常常是由同一個人擔任好幾個任期。這種強調個人節奏的修道生活，則由各自所屬的公務所管理，譬如教堂聖器收藏室管理人（教堂看守人）、管理教堂內部事務者（或司儀）、總務或財產管理人等各自管理。

君士坦丁堡的 Jeremiah II 主教，得力於亞歷山大 Silvester 主教之助，試圖解決導因於崇尚個人節奏制度所延伸出來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存在於阿陀斯山修院，也出現於希臘東方大部分的修院之中。當 Silvester 於 1574 年拜訪阿陀斯時，Lavra 和 Vatopaedi 的許多老建築回復了共修的制度，不過似乎持續不久。這股潮流只在十八世紀末時才又轉回來。從 1784~1839 年，有八間修院在依照修道會規（monastic Rule）的情況下，回復共修的生活方式。

阿陀斯山在整個土耳其人統治期間，修院生活明顯地出現各種離心的傾向，四處可見其他形式之修院制度的延展，諸如各種隱修團體的住所（sketes）、獨修小屋及僻靜住所等。這些小型的住所，皆為修院所有，並允許「長老」（elders）及其追隨者前來居住生活。

這些隱修團體的住所，引人聯想到古老的 lavras，它們非由單一建築構成的綜合體，而是圍繞著中央的教會、包含獨修小

屋或臨時營房 (huts, 駐紮) 等所構成, 稱之為「主堂」(kyriakon)。在這些隱修團體的住所中, 修道人按個人節奏而生活, 但接受一位他們所推選的先進的監督。而其中最古老的一個隱修團體, 乃自十六世紀即已存在、隸屬於大拉夫拉修道院的 St. Anne 隱修團體。十五世紀初之前, Kerasia 地區也有同樣的修院, 擁有一群由這類雛形的隱修團體 (a sort of embryo skete) 所組成的獨修小屋。同屬 Lavra 的 Kafokalyvia 隱修團體似乎在十七世紀末亦已建立。至今仍尚存的隱修團體有 Vatopaedi 的 St. Demetrios、Pantokratoros 的 Prophet Elias、St. Paul 的 New Skete 和 St. Demetrios Lakkos、Iviron 的 Prodromou、Koutloumousiou 的 St. Panteleimon、Xenophontos 的 Evangelismos 等, 皆建立於十八世紀。

只有少數隱修團體是於十九世紀中葉之後出現的, 如直至今日仍有俄羅斯修道人居住其內的 St. Andrew of Vatopaedi, 以及羅馬尼亞修道人的 Prodromou of Lavra 等。

獨修小屋算是較單純的修道生活形式。但它們雖小, 卻是由數個建築緊密地組成, 自 1661 年起即成為修院的主體, 而且通常由一位「長老」和追隨他的修生 (spiritual followers) 所占用居住。並非所有這類的獨修小屋, 皆是持續古老的獨修小屋, 或由古老損毀的小屋改建而成, 而大部分它們仍都保留其拜占庭的名稱。

在拜占庭期間, 阿陀斯山的居民尚不被注意。十一世紀時, 有 700 位修道人生活在大拉夫拉修道院中, 登記有案。但聖山的居民仍不穩定, 因為從十至十五世紀間, 新的修院相繼建立, 而小型機構不是消失了, 就是被併入大型機構中。因而個別的修院便產生了一些因此情況而起的危機與問題, 這些危機與問題也就造成了全體居民的一些變動。

土耳其統治期間，我們擁有較多的資料。自十五世紀晚期起前來的遊歷者，從 1764 年土耳其的課稅名冊和修道人的人口普查中，幫助我們得到一個較清晰的圖像，至少是阿陀斯山居民的分布數量。但其描述的差異極大：從 1525 / 1530 年的課稅名冊中有 1440 人，到十六世紀正教遊歷者與修道人有 2246~2860 人。1764 年的人口普查有 2908 位修道人，到 1808 年有 2390 人。一般而言，我們可能會認為在希臘革命 (Greek Revolution) 時期，修道人的數量急劇減少；而時代的轉變，當阿陀斯山因數以千計的斯拉夫修道人所導致的結構性衰退，估計當時阿陀斯山的居民不會超過 3000 人。

八、阿陀斯山的寂靜靈修與學術發展

儘管 500 年來的財政困難以及接踵的歷史性災難，阿陀斯山的發展卻進入了東正教會最重要的靈修中心 (the most important spiritual centre of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十四世紀這裏所獨創寂靜主義的靈修活動，有許多學者修道人在阿陀斯居住、寫作，這個傳統並未完全失傳。十六世紀中葉，文藝復興的一些初期記號在此已顯而易見。幾乎所有的修道院都設有繕寫室 (或藏經樓, scriptoria)，圖書館裏充滿了大量繕寫室裏的手稿抄本。可惜至今對這些的相關研究仍很少 (如 Iviron 修院、Koutloumousiou 修院、Dionysiou 修院、Philotheou、Xeropotamou 修院等)，不過這些證據都顯示修院的繕寫室一直持續使用到十七世紀，直到印刷書籍的出現才取代了手稿抄本。

大量收集各種書籍、手稿抄本、文件，甚至學者們的私人圖書館，如都主教 Thessaloniki Makarios、Maximos Margounios、宗主教 Dionysios IV 及 Metropolitan of Arta 和 Nafpaktos Neophytos 等，

都為阿陀斯山修院已具極大規模的館藏增加更多收藏品。

這樣的情況在東方所有的修院圖書館中亦然，阿陀斯山的圖書館可能是使用頻率最高的，像這樣有如數座倉庫的各種遺物的收藏，絕對無法被取消。相對於一般人的意見，阿陀斯山修院圖書館在土耳其人占領的數百年中，則是提供了很多神職和平信徒學者們書籍的來源。

很多學者，大多是修道人或神職人員，在其生活中一些艱困的時期，皆在修院裏工作和寫作。典型的例子便是著名的學者和啓蒙者 the Russian Maximos the Greek¹⁵，他在從西方返回後，十六世紀之初，選擇了 Vatopaedi 修院作為退隱。過不久，修道者 Pachomios Rousanos 在 Iviron 的圖書館中留下了他卓越的成績。

其他有學問的修道人，亦在阿陀斯上得到了他們學術活動等著作的名聲。較早的 Dionysios of Iviron，以他人的名字 Dionysios 取名，是 Studium 的修辭學家、撰寫大眾化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家 Agapios Landos，以及富有創意的修道人 Xeropotamou Kessarios Dapontes 等，都是學者層級的典型代表人物。

甚至還有更多受高等教育的神職人員，獲有更高的地位，都選擇在這寧靜的阿陀斯山修院結束他們生命最後的日子。雖然這些人可能未寫下什麼著作，但他們所展現出來的精神，已決定性地提升了阿陀斯山的靈修層級。

十八世紀，在整個東方廣為流傳的靈修精神及社會、經濟的復甦，在阿陀斯山顯然也有兩件重要的事件發生：其一是學校的創辦；其二是拒絕在主日為亡者祈禱的靈修運動（Kollyvades，下詳）。

¹⁵ 希臘人，至俄國修訂聖經的譯文。

1748年，一所學校首創於 Vatopaedi，並由 Vatopaedi 提供資金，就興建在修院的邊界上。包含了希臘文、哲學與神學等，一系列雄心抱負的研習課程。這所學校，成為 Hellenism 知名的第一等學府，它坐落在靠近修院之山丘上一座氣勢宏偉的建築上，很多這裏培育出來的學生相繼成為學識淵博的知名人士。首任校長即著名的 Evgenios Voulgaris，管理這學校數年之久。

九、kollyva 之爭

爆發於 1754 年的 kollyva 之爭，即後來所熟知、發生於紀念活動服務 (memorial services) 上獻出已煮熟的小麥之事。由於已煮熟的小麥乃專門為亡者祈禱的祭品，而此一紀念亡者的禮儀服務，有人不同意只能在週日舉行，主張亦可在週六這一同樣具有傳統的時間來舉行。但真正的原因其實更深，導致修道人分裂成兩相敵對的因素為：傳統的擁護者 (Kollyvades) 主張不僅該對傳統有一堅持的信守，而且也應回歸偉大的東方教父而有的教父著作和苦修神學的根源上。很多擁護者本是非修院內的教士，卻越來越接近修道生活方式。這一傳統的擁護者，被視為是阿陀斯山的學者，如極富創意的 Nikodemos the Athonit、好戰的 Athanasius Parios、前任 Corinth 的都主教 Makarios Notaras 等。

此一事件剛開始時，這些傳統的擁護者被判有罪並受到迫害，但隨後即被證明為無辜。它已流傳到阿陀斯山之外，尤其到了群島及 Peloponnese 等地，導致了 Philokalian 的復興，在正教斯拉夫世界中有一相當深度的影響力。

阿陀斯山的修道人對爆發於 1821 年在 Macedonia 和 Halkidiki 之爭的希臘革命 (Greek Revolution) 無法保持中立。的確

有很多人，如激進的 Nicephoros、秘書 Iviron 等，自加入「友誼社」(Friendly Society, *Philiki Etairia*) 長時間以來，導致了「獨立戰爭」(War of Independence)。1821 年 5 月，阿陀斯山正式向其支持者宣告，希臘革命運動由 Emmanuel Papas 所領導，在卡耶斯中間的居民欣喜不已。土耳其的官員被逮捕，並拘禁在 Koutloumousiou 修院中，而武裝的修道者們也部署於阿陀斯山的各個邊界上。

此役很快地即被北希臘 (Northern Greece) 鎮壓住了，而修道者們則必須為他們參與此役而付出代價。土耳其的士兵駐營在各個修院裏，並強迫修院提供他們維生之需。沈重的課稅 (3,300 purses, 土耳其幣，相當於 1,750,000 披亞斯德)¹⁶，強制聖山一次付清，且定期的課稅有兩倍之多。Halkidiki 的附屬事業遭到嚴重的損壞，而由 Moldo-Wallachian 的附屬產品收益的收入，也至少被停收了五年之久。債務的攀升、大量的修道人離開了阿陀斯山，而且很多修院亦被降為貧戶，被強迫變賣其聖物或遺物，雖然大部分較珍貴的聖物已被送到安全的希臘革命島上了。

這些制裁在 1830 年被解除。一個新的災難於 1863 年爆發，其時羅馬尼亞政府在 Moldo-Wallachia 盜用了所有阿陀斯山的土地及其附屬事業。這個浩劫後來在 1873 年更進一步地受到打擊，其時乃俄國政府決定驅逐 Bessarabia 土地上及 Caucasus 的所有修道人，並只支付修院從這些財產中收入的五分之二的錢。在 1917 年的十月革命之後，這項收入來源便完全給榨乾了。

十九世紀的後半葉，阿陀斯山在巴爾幹半島的種族主義者之爭中受到波及，並且由於俄羅斯政府試圖改變修院地位的種

¹⁶ piastres, 即埃及、敘利亞、蘇丹、土耳其等國的貨幣單位。

族特性，而起用大量的斯拉夫人，使他們陷入困境中深受折磨。這些斯拉夫人大多是俄羅斯的修道人，他們滲透到貧窮的修院及其附屬事業中，並興建大型的修院機構。至廿世紀初之前，阿陀斯山已有大約 3,500 位俄羅斯的修道人。由希臘海軍所展開的阿陀斯解放運動，於 1912 年 11 月爲此危險處境劃下了句點，修院情況現成爲自我管理、隸屬於希臘的一部分。它的合法地位，在希臘的憲法中得到確認，並也由它自己於 1926 年制定的憲章得到明確的定位。這份阿陀斯山的憲章在幾經修改之後，確認了修院地位的傳統行政制度。

十、今日的阿陀斯山

今天，阿陀斯山有 20 座擁有獨立自主權的團體修院，恰與十六世紀所確定的數量一模一樣。從屬於這些修院的行政與靈修中心，則有 12 座隱修團體的住所，和大約 250 個獨修小屋。每一個修院皆是獨立自主的，而修道人的生活管理，則依據全體修道人所共同制定的修院會規和內部法令來管理。每一年，每個修院推選一位修道人，代表出席「神聖團體」（Holy Community）。這個神聖團體的組織，處理有關聖山的一切事務，並且監督一些修院內部管理較爲平穩的工作。這個神聖團體的行政組織，也就是修院代表團（Holy Epistasia）。

阿陀斯山現隸屬於君士坦丁堡的大公宗主教（Ecumenical Patriarch）的治權（spirituality jurisdiction）之下。而希臘的處境亦由聖山的總督（Civil Governor，或特首）所呈現。

聖山在廿世紀早期數十年的衰落，導因於崇尚個人節奏生

活的弱點，以及因隨後馬其頓¹⁷盜用了修院土地而致收入急劇短少，加上邪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後來的六十年停止發展。

今天，阿陀斯山再度開花結果。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成群地加入修院，包括聖山中所有的共修團體、隱修團體及獨修小屋等。

¹⁷ Macedonia (馬其頓)，位於歐洲，原南斯拉夫聯邦六個共和國之一，1991年宣布獨立。